

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英]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 著
[英]马修·博蒙特 (Matthew Beaumont) / 著

王杰 贾洁 / 译

批评家的任务

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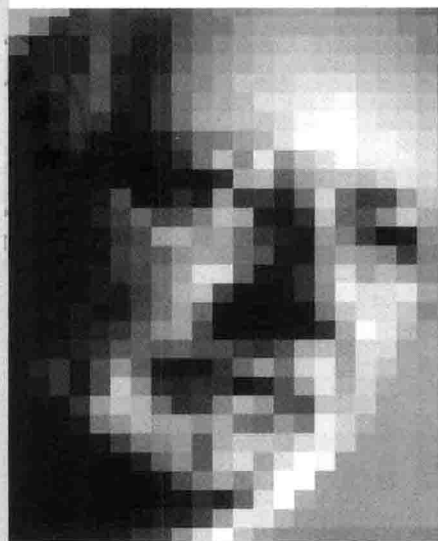


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 著
博蒙特 (Mathew Beaumont)
王杰 贾洁 / 译

批评家的任务

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Q.C.
PASSED
3



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41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英)伊格尔顿(Eagleton, T.), (英)博蒙特(Beaumont, M.)著;王杰,贾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1-24825-6

I. ①批… II. ①伊… ②博… ③王… ④贾… III. ①伊格尔顿, T. —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56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6940号

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

By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mont

ISBN: 978-1-84467-340-7 (hbk)

978-1-84467-339-1 (pbk)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著作责任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 [英]马修·博蒙特 著

王 杰 贾 洁 译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825-6/I·28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2.75印张 264千字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访谈,正如彼得·奥斯本所言,是“精雕细琢的小说作品,令人惊讶地将转瞬即逝的声音符号创造成为有据可依的白纸黑字”;“不过,成文的访谈,基本上都是巧妙编辑的结果”。《批评家的任务》一书所收集和编录的材料几乎都是特里·伊格尔顿和我在伦敦、曼彻斯特以及牛津地区进行的讨论交流,从2008年到2009年持续了大约9个月的时间。在本书的个别地方,我额外补充了伊格尔顿的陈述,补充性陈述均出自他之前写的文章、著作,书单可参见书末的参考书目。伊格尔顿本人对这些补充性陈述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访谈录算得上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小说作品。我首先要衷心地感谢特里·伊格尔顿,感谢他在讲述自己的思想生平和阅读修改手稿时的细心周到、宽容大度以及好脾气。我也要衷心地感谢纳塔里·豪,他精湛高效地协助我完成了本书从早期录音、文字记录到手稿成型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塔里克·阿里、乔安娜·博蒙特、迈克尔·博蒙特、托尼·品克尼、马克·马丁、斯蒂芬·雷根、简·沙利斯、娜塔莎·沙利斯、苏珊·沃特金斯、托尼·伍德,他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此外,特别感谢塞巴斯蒂安·巴德根。

马修·博蒙特

序 言

“批评家的任务”应包括对现今的大人物的批判,对宗派的批判。是形相批评、策略批评。辩证的批评,是从个人评价以及作品自身的重要内容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瓦尔特·本雅明,《批评家的任务》

1930年代伊始,瓦尔特·本雅明计划写一系列论文学的论文,意在将“批评作为一种体裁予以一番再造”。当年,出版社草拟于4月份合同中提到有十三篇论文,包括两篇未成型的文章和一些已经发表的论文(如《超现实主义》与《译者的任务》)。就像巴黎拱廊研究计划那样,本雅明已经有了研究纲要。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这本书未能面世,他将此视作他人生中的一次“大规模的失败”。不过,他努力再造批评的重要残篇幸存了下来,譬如他详细思考优秀批评中引证的重要性的论文《文学批评规划》,以及主张“文学史与批评之间的区别必须

2 批评家的任务

被拒绝”^①的论文《作为文学史基本原则的批评》。1930年代初的这些珍贵的沉淀奠定了本雅明写作《批评家的任务》一文的基础,这篇文章原是那计划中的十三篇论文之一,该文第二段提道:“以为‘他个人的观点’体现了对于真正的批评家而言所不可或缺的才能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本雅明强调“越是重要的批评家,越能避免鲁莽地坚持他个人的观点”,“他的洞见越能贯注于他的见解中”:

不同于放弃自己的观点,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使别人在理解其批评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此外,对批评家形象的界定不是一件私人事务,而应当尽可能地客观、严谨。了解一个批评家就是要了解他的主张。一个批评家也应该向我们展示这些。^②

特里·伊格尔顿与他同时代的人不同,我们知道他有他自己的坚持。1960年代末后,由于政治受挫,很多不坚定的思想机会主义者被后现代主义呈现的一代批评家的绝望感所引诱,而伊格尔顿没有彷徨畏缩。从本质上讲,在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所承诺的将街道起义者的能量变换至语句的诱惑下,他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应对一系列不同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情境时,反复告知我们他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本雅明认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做的。有时,这会令他的对话者无法理解,闹出笑话。199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卢卡奇的书中收了一篇伊格尔顿访谈,不惹眼。在文中,伊格尔顿反复声明他既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访问

① Walter Benjamin, 'Criticism as the Fundamental Discipline of Literary History',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2, 1927 - 1934*,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et al., eds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p. 415.

②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2, 1927 - 1934*, p. 548.

者艾娃·L.科瑞多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她强调说:“你是一个左翼批评家和一个社会评论家”,“但如果你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你写的只是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对她持有这种粗浅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定义同样感到不解。伊格尔顿坚持两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解读”;“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必须有合理的限制”。拥有牢固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框架的科瑞多显然无法吸取这个辩证的观点,在伊格尔顿提出对于像总体性这样的概念我们必须在捍卫的同时予以革新时,她仍然不加掩饰地表示怀疑。“我为你的诧异感到诧异”,伊格尔顿竭力保持礼貌地说:“从某种重大的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我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在最近斯大林主义垮台后,我依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大量的批评写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点也不容置疑。”^①

在四十余年的批评家生涯中,伊格尔顿一直在思考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意义是什么。他仔细研究矛盾的理论以及矛盾的政治实践形式,尤其是女性主义,寻找再次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令人深思的是,在伊格尔顿格外多产的1980年代初期,尽管他援用了某些后结构主义的深刻见解,但他无时无刻不坚守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例如,在《克拉丽莎被强暴》(1982)一书中,他抓住塞缪尔·理查森小说中傲慢的布莱希特精神,以当代读者的视角甚至可以说是非学术性的视角令人难以置信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是坚定不移的,尽管他的批评方法明显受惠于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但这些没能取代马克思主义传统方法对他的影响,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他强调“性别”“远不是阶级斗争的替代物,而是用于

^① Eva L. Corredor, ed., *Lukács after Communism: Interview with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5-6.

4 批评家的任务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手段”^①。在该论著中他采用了拉康的概念,因此坚决抵制替补的逻辑,认为替代物终将耗尽或清空它所替代的东西。伊格尔顿常常运用其他的学说来完善马克思主义,考查它的局限,重新阐述它、改造它,但从未背弃它。

认为伊格尔顿的批评会脱离,哪怕只是部分地脱离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好比因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983)这部伊格尔顿最成功的著作没有论及马克思主义的章节,他因此不能证明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假定他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变节者一样。一本严谨的文学批评理论书原本应当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的章节,以突显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伊格尔顿书中的缺场反倒是马克思主义在他书中无所不在的信号,体现了伊格尔顿对信仰的忠诚。就如同本雅明认为大众是波德莱尔诗歌的固定背景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方法,以一种内在批评的形式,渗透到了该书所讲的各个理论中,从而继续抵制被具体化。伊格尔顿在1976年时曾预言:“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将看到马克思主义批评轻松地挤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神话学方法之间进行文学分析,成为迄今为止的又一振奋人心的学术‘方法’,又一适于研究者去跋涉探索的领域。”^②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粹的方法一揽子推销给读者。“任何一位期待着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在该书中的读者,显然在读这本书时不够用心”,他在书末的结论部分严肃地总结道。从这点来看,伊格尔顿不像质疑或要变更文学理论的界限那样简单地阐明文学理论的范围。

^① Terry Eagleton, *The Rape of Clarissa: Writing, 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 (Oxford: Blackwell, 1982), p. 88.

^②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1976), p. vii.

“我不是以某种文学理论来批驳我书中列出的这些理论,而是以一种不同类型的话语来批驳”,他补充说,话语“包括其他这些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文学’),并通过将这些理论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中来改变它们”。^①这个话语,正是马克思主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学院马克思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连的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最后一章“结论:政治批评”,是有意为之的赘述。伊格尔顿表示这本书中写到的所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性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由意识形态各异的思潮塑形的;二是它们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政治性,实际上是宣传和阐释受政治影响而成的文化的一种高明的策略。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与性情繁多的自由人文主义相比,在发挥政治功用方面更具自觉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使自由人文主义变得偏激起来,这又使得它们猛烈地批判自由人文主义,而不是粗暴地对其加以排斥。“自由人文主义批评家一心想要的并不仅仅是对文学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他们更希望以那些将会深化、丰富和扩展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来讨论文学”,伊格尔顿写道:“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批评家在这点上跟他们几乎完全一致,问题仅仅在于,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批评家希望强调指出,这种深化和丰富必然要求对一个分裂为阶级以及存在性别差异的社会进行改造。”^②自由人文主义者支持以文化抵制文明的溃败。而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则认为,任何一份记载文化的文献也同时是一份关于野蛮的记录,在存在剥削的环境下改造文学,有可能使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承担起废止资本主义的责任。借用本雅明的

①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204-5.

②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p. 210.

6 批评家的任务

另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名义上是以被解放了的人类子孙的视角来解读文学,但实际上是通过被奴役的祖先的视角来解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怀疑性的解释学,同时也是一门救赎性的解释学。

詹姆斯·史密斯在他最近出版的论伊格尔顿的专著中评论道:“当许多批评家讲伊格尔顿著作的影响波及他们的领域时,就意味着很难界定出一种明晰的‘伊格尔顿式的’批评实践或批评理论的方法,很难指出把伊格尔顿引为创始人的学派或学科,不像其他一些与伊格尔顿一样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间的文学文化理论有影响的人。”^①史密斯在他这本友好而富有洞察力的专题论著中要说明的是,伊格尔顿的思想不能被归结为一种静态的方法,是因为其思想在回应发展中的当代思想时是如此地多变和具有创造力。根据史密斯的说法,伊格尔顿“已经攻占了一块较艰难的领域,他在他的位置上不断调适、对抗和演变,他时常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对已有争论的论辩性干预,展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评价和参与思想运动及潮流的能力,同时他也在维护和开拓高度敏感与重要的领域”。史密斯认为,把伊格尔顿的那些“看似分散的立场”串到一起,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致力于探索“什么样的批评可以被新的社会和思想信仰所接纳,以及批评家在发挥社会政治功能时的责任”。^②

史密斯着重指出伊格尔顿执着于反复阐明批评家的任务,这个看法颇有见地。在过去的四十余年里,伊格尔顿一次次地质问资本主义

① 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8), p. 2. 威力·马莱曾经从纯修辞学的角度戏谑地定义过“一种伊格尔顿主义”,即“一种灵活的论辩手法,通过一种带有陈腐、怪诞、野蛮的‘现实’立场,以修辞性的辞藻专门揭穿高雅文化的形象”。See ‘Brother Tel: The Politics of Eagletonism’, *Year’s Work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1:1 (1991), p. 273.

② Smith, *Terry Eagleton*, p. 2.

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追溯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发掘有机知识分子的政治机遇。就这一点来说,《批评的功用》(1984)一书或许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该书对现代欧洲批评中一直以来都暗藏的由无利害性这一意识形态所维持的政治野心予以了历史的批判,细致入微又通俗易懂。伊格尔顿也在书中系统地解构了 T. S. 艾略特同名论文《批评的功用》(1923)中的征候式断言,即一般说来,批评家的任务是“才智的无利害关系的运用”,特别体现在“阐明艺术和端正品味”方面。^① 在伊格尔顿的许多其他著作中,他也探讨了圣人、学者及反叛者的伦理-政治责任,评价他们分别对资本主义批判作出的贡献,并通过综合这些典型来重构激进批评家的典范作用。史密斯还有一个看法也很正确,即他十分赞赏伊格尔顿的论辩技巧,维护和开拓“高度敏感与重要领域”的能力以及理论结合激进批评实践的能力。引用本雅明的话说,伊格尔顿的论辩“贯穿在书中,像食人者在调味一个婴儿那样尽心”^②。近年来比较好的例子是他写的《理性、信仰与革命》(2009)一书,在书中他对启蒙原教旨主义者(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ts)理查德·道金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等人进行了饶有趣味地批判,认为他们无视整个宗教的历史,并轻率地将之归为虚假意识。与当代的另一位著名论辩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一样,伊格尔顿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某种特定的基督教形式应该“并肩作战,抵抗新唯灵论的进攻”,“真正的基督教遗产太珍贵了,不能沦落为原教旨主

① T. S. Eliot,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in *Selected Prose*, ed. Frank Kermode (London: Faber & Faber, 1975), p. 69.

②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I, 1913-1926*, eds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p. 460.

8 批评家的任务

义者的畸形想法”。^①

本着恩斯特·布洛赫的精神——布洛赫与伊格尔顿都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布洛赫并非从一开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在《理性、信仰与革命》中指出,唯物主义者必须承担起一项重要且非常辩证的任务,即从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中解救其批评的乌托邦性质。^②譬如,日常生活中对信仰和知识间的关系的某种辩证理解源于基督教的教义,伊格尔顿却令人吃惊地关联至“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认为的革命理论只有基于大众革命运动才能实现”的理论:“知识采集自行动着的战斗,而行动着的战斗表明了信仰。”^③他以一种幽默的、透彻的修辞风格从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那里解救和改造某些基本的基督教教义,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在《卫报》和《伦敦书评》上,在《理论之后》(2003)等书中,伊格尔顿的干预性的论辩文章很有影响力。2007年,他对马丁·艾米斯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攻击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的言论进行了声讨,这在英国引发了不小的争论。^④

在那种争论的环境下,伊格尔顿被攻击成一名列宁主义者,他很久前写的文章都被翻出来说事。(1960年代末,伊格尔顿尚不清楚当时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关于解放神学的论争,他在他最重要的神学申明

① Slavoj Žižek,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2n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8), p. xxix.

② See, for example, Ernst Bloch, *Atheism in Christianity*, trans. J. T. Swann (London: Verso, 2009).

③ Terry Eagleton, *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21.

④ See Geoffrey Levey, 'Spicier than a Novel: The Literary Feud Raging between the Amis Dynasty and the Marxist Critic', *MailOnline*, 11 October 2007, www.dailymail.co.uk.

中宣称：“对神父的最佳理解是：列宁主义者式的革命领袖。”^①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于2008年发行了第三版，戴维·沃姆斯利，这位继伊格尔顿之后的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沃顿英国文学教授，严厉地批评了该书，称“一位列宁主义者试图使文学研究的思想财富贬值”^②。不过，让沃姆斯利震惊和欣慰的是，像其他左派分子一样，伊格尔顿近来重新审视了列宁，认为列宁作为一名革命行动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关系应该比较多而不是较少。^③虽然他拥戴列宁，但也批评了列宁。沃姆斯利是当下英国右派中的一位思想日趋尖锐的理论家，用史密斯的话说，他不能容忍伊格尔顿的论著“在社会范围内实现某种政治功能”——即便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史密斯注重伊格尔顿著作的论辩的特色——实用、反应迅速，但对其著作的系统性评价不够。如果说伊格尔顿是一位卓越、有活力、好战的思想谋士，像其《持异议者》（2003）中所举的那些出色的例子那样，那么他也是一位有战略的思想者。本雅明说过，批评家“是处在文学斗争中的军事家”^④。首先，伊格尔顿有着无止境的创造力，至少从1970年代初开始，他就有意论证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批评家创造了最优秀的细心的读者，在《权力的神话》（1975）一书的导言中，伊格尔顿指出这些读者将“书页中的文字”当作历史本身“晦涩的却可破译的符号”来解读，他用了句老话，“历史批评”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把

① Terry Eagleton, *The Body as Language: Outline of a 'New Left' Theology* (London: Sheed & Ward, 1970), p. 76.

② David Womersely, 'Overrated: Terry Eagleton', *Standpoint*, April 2009 <http://www.standpointmag.co.uk/overrated-april-09-terry-eagleton>.

③ See 'Lenin in the Postmodern Age', in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eds 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Žižek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2–58.

④ Benjamin, 'One-Way Street', p. 460.

10 批评家的任务

握作品”。^①从那以后,无论是他写的专业性著作还是大众化著作,他总以深入地、探究性地理解处于历史发展中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为前提,不懈地倡导一种细致严谨的修辞分析。^②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批评不是一门可以忽略的学科,尽管它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下一直被边缘化。他最近提道:“语言是 Culture 与 culture——文学艺术与人类社会——走向自觉的媒介”,“而文学批评对语言这一令人之所以为人的媒介的含混和复杂具有敏感性”。倘若文学剖析肩负着批评的使命,它也有着乌托邦的维度:“顾及感觉和文字形式就是拒绝以纯粹工具性的方式对待文学,抵制把语言用作商业和官僚文书。”^③这是文学批评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

其次,就哲学方面而言,伊格尔顿所付出的持之以恒的努力也让人印象深刻。自 1960 年代末开始,他致力于建构关于伦理学和美学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唯物主义的叙述,该叙述因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劳动的身体而产生,同时伊格尔顿也指出该叙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被救赎的可能性。至少从《作为语言的身体》(1970)开始,伊格尔顿就在创建这项批评-乌托邦工程。他强调马克思主义重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人道的异化,以社会学和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人的主体性、客观化、物化等”^④,几乎是直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社会学和现象学理论影响了伊格尔顿早期的神学写作,也决定了他之后迈向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写作。但他的兴趣点大体上保持着一致,从《新左派教会》(1966)中他依据基督教的“慈悲”观念颂

① Terry Eagleton,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 anniversary ed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3–14.

② See Terry Eagleton, ‘Capitalism and Form’, *New Left Review* 2:14 (2002), pp. 119–31.

③ Terry Eagleton, *How to Read a Poem* (Oxford: Blackwell, 2007), pp. 9–10.

④ Eagleton, *The Body as Language*, p. 107.

扬共产解放的乌托邦目标,到最近出版的《陌生人的麻烦》(2008)中他颂扬他所称的“政治之爱”。基督如同被碾碎的人体圣餐,仍然或隐或显地作用于他的思想,或许只有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被碾碎的基督形象才能重归完好。对伊格尔顿来说,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双手是列宁的拳头的隐喻——就像色彩斑斓的呈现双重立体光栅效果的圣像明信片。压迫同时意味着救赎,在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电影《银翼杀手》的高潮部分,拥有撒旦与天使双重面孔的罗伊·贝逊的指甲穿过手掌变成匕首,这是因怨愤而生的致命的武器。伊格尔顿认为,政治替罪羊“在消极的默从中孕育着革命的种子”^①。被侮辱的或被驱逐的群体,例如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是那些以激进方式要求变革的声音的代言人。

《美学意识形态》(1990)和《陌生人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姊妹篇,因为异化和去异化的身体的伦理学是伊格尔顿持续思考的课题,而二者对此都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前者的结尾部分,伊格尔顿提出:“唯物主义伦理学在它的具体特殊性方面就是‘美学’,它从实际的需要和个体存在的欲望出发来讨论问题。”^②这些非同一性的需求使个人在诸多矛盾中融入集体。激进政治试图在普遍及特殊层面上都能尊重和满足他们,力求(马克思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伦理与政治不可分割。这不是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主张的伦理自动取代了政治,当詹姆逊说伦理是“神秘化的意图符号”时,伊格尔顿认为他有以伦理反对辩证思想的

^① Terry Eagleton,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Oxford: Blackwell, 2003), p. 279.

^②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1990), p. 413.

12 批评家的任务

苗头。^① 在《陌生人的麻烦》中,伊格尔顿指出,伦理和政治“不是相互分离的领域,而是看待同一对象的不同视角。前者研究的是需求、欲望、品德和价值,后者考查的是随之而生的清晰明了的习俗、权力形式、体制和社会关系”^②。或许这段话稍有些类似唯心主义者的口吻,但伊格尔顿坚定地认为,此二者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使它们具有了变革社会的意义。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伦理学观点:“认识一个人的本质,要看他是否为他人创造了空间以便他人能为其他人创造空间”,从而在实践中全面完成阶级社会的政治转变。^③ 《美学意识形态》在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特殊主义的政治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坚持“差异必须经历同一,才会真正到来”^④。《陌生人的麻烦》在反对拉康的“真实界的伦理”时表达了这个观点,“真实界的伦理”最近受到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推崇。该书还从政治和人际关系的意义上提出了与欲望伦理相对立的爱的伦理。当然,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其统一的批评事业的不同侧面。

史密斯认为不存在独特的“伊格尔顿式的”批评理论或批评实践,这句话在伊格尔顿的对手看来太过谦让了。伊格尔顿的追随者曾郑重表示,因为不像德里达学派或拉康学派那样存在一个伊格尔顿学派,所以伊格尔顿无法成为一个原创或系统性的思想家。他们仿佛在阐述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但这个古怪的宗派主义式的声明实际上误解了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恪守,伊格尔顿在大量的、有时甚

① Fredric Jameson, *Fables of Aggression: Wyndham Lewis, the Modernist as Fasci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56, cited in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Allen Lane, 2003), p. 143.

②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2008), p. 316.

③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p. 308.

④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p. 414.

至相矛盾的思想传统中仍然坚守着马克思主义,他的措辞可以彰显他的思想。如果没有伊格尔顿学派,那是因为他的追随者都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像 1880 年代英国的那些恩格斯的追随者一样。附带举个例子,那些称自己是“詹姆逊专家”的批评家在私底下可能多多少少都希望詹姆逊有关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可以脱离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伊格尔顿的思想跟詹姆逊的一样,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中抽离出来,它们对不断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着重大贡献。托洛茨基曾经在《文学与革命》中宣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活传统里”,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一直试图使传统思想名誉扫地,但伊格尔顿几乎把它当作口号在津津乐道。在文学文化理论领域,无论是仿效伊格尔顿还是詹姆逊,都意味着必须接受不能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历史上对于阶级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推翻资本主义革命思想的鲜活叙述进行了总结。不管怎样,那些以某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名字命名的学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唯物主义。在一个理论中添加太多脱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信仰是在向唯心主义投降,伊格尔顿将此定义为“知识分子自发的意识形态”^①。一言以蔽之,倘若“伊格尔顿式的”这一术语有任何化合价的意义的话,那么就是它将见证在建的伊格尔顿学派的破产。

詹姆逊在他近期出版的一本访谈集的发人深省的序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自己在理论写作中的各种不安分的尝试进行了总结,指出自己是试着去理解那些重新论述和阐释旧的认识论问题的新语言的。詹姆逊认为,这是一个学习与重新学习准则的问题。他轻蔑地说道:谈论“影响力”,“是谈论这些准则的比较愚蠢的方式之一,

^① Terry Eagleton, *Scholars and Reb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eland*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8.